

古埃及遇上古希腊：一场对话跨越千年

演讲 颜海英 整理 本报记者 徐蓓

提起古埃及文明,你一定会想到木乃伊、金字塔。为什么古埃及文明会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在与外来文明碰撞和交融的过程中,它是如何流传下来的?请听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颜海英在中欧深圳校区“人文中欧·博约讲堂”上,以古埃及文明和古希腊文明的交融为例,为我们解读其中的奥秘。

埃及艳后为何讲希腊语

很多人看《埃及艳后》这部影片时,都会有这样一个疑惑:为什么埃及艳后在和两位罗马统帅恺撒大帝、马克·安东尼谈情说爱的时候,不是说埃及语,而是说希腊语?

其实,这个小小的细节背后,隐藏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古埃及和古希腊两个风格迥异的文明,跨越千年,不断地碰撞和交融,留下了很多耐人寻味的历史线索,留待后人去探索和发现。埃及艳后讲希腊语,就是历史线索之一。

通常认为,古代文明分为青铜时代的文明和铁器时代的文明,两个时代前后相距1000年左右。古埃及文明属于前者,古希腊文明属于后者。

两者都位于地中海文明圈,所以很早就产生了密切的来往,例如,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泰勒斯、毕达哥拉斯等都曾到访埃及;古希腊“梭伦改革”时曾让工匠集体到埃及学习先进工艺。希腊早期的雕像在造型上主要模仿埃及,希腊的很多地名也来自埃及。

进入铁器时代后,埃及国力日衰,一度沦为波斯帝国的行省,而古希腊则进入高速发展期。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埃及,埃及被并入亚历山大帝国的版图。埃及文明和希腊文明之间不再是原来的学习与借鉴的关系,而是在同一个帝国疆域内直接地融合。

当然,这种融合是一个漫长而递进的过程。整体来看,两个文明的融合过程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希腊文化压倒式地覆盖了原来的埃及文化;第二阶段,古埃及进入“双面社会”,两种文化逐渐深度融合;第三阶段,古埃及传统文化强烈地回流,对西方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将分析每个阶段的特征,并探讨其对我们的启发。

两个文明,一个外向一个内敛

第一阶段:希腊文化覆盖埃及。
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西战十余载,在打仗之余,他还做了一件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事情——重建被波斯人摧毁的希腊城市,以及在重要的地点新建希腊城市。据不完全统计,他重建和新建的城市共有70余座。

征服埃及后,他新建了亚历山大港,其直到今天依然是埃及最重要的海港城市。

为什么要建设城市?因为城市是一种传播生活方式的有效载体,亚历山大大帝希望借此传播希腊人的生活方式。希腊人历来信奉“健康的心灵一定要寄居于健康的体魄中”,所以希腊式的城市非常标准化,一定有体育馆、运动场,也会有剧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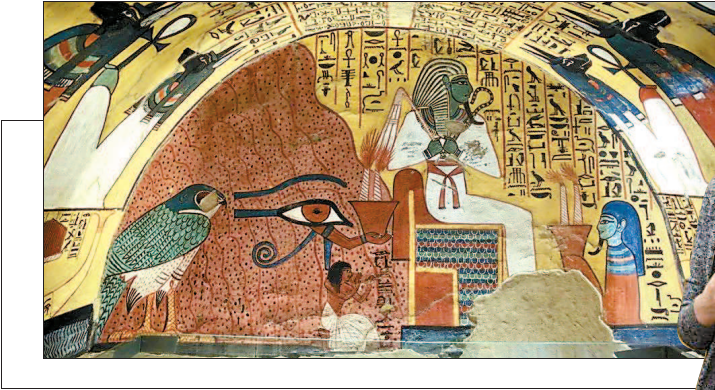
除了城市化,教育组织化也是传播希腊文化的手段之一。

亚历山大大帝因病去世后,他的部将三分其帝国,托勒密统治了埃及。托勒密王朝在埃及大力推广希腊语,四处派遣希腊语教师,兴建图书馆,并出台了大量的鼓励政策,如埃及人只要学希腊语就可享受税收减免,这些措施使得希腊语深入埃及民间,即使打官司时也使用希腊语。

可以说,在这个阶段,古埃及文化被希腊文化压倒性地覆盖了。

也许有人会问,古埃及文明曾经如此辉煌,为何轻易就被希腊文化覆盖了?这和两种文明本身的风格迥异有关。

希腊文明是外向型的,善于表达,比如它的语言,它的概念、方法、体系,易于传播。而埃及文明以具象的、图像的象征和神话、仪式这些形式来表达自己,属于内敛型的,不擅长对外传播



和渗透。所以在最初的时候,东方文明刚刚接触到希腊文明的那个体系,有一段时间表面上东方文明被覆盖了,出现了一个东方文明的隐没期。

而且,希腊地区地少人多,资源紧缺,人们必须不断往外扩张以求生存,就像柏拉图所说的,“我们环绕着大海而居,如同青蛙围绕着水塘”。

希腊文明中固有的挑战、冒险和开拓精神,往往具有很强的征服性,所以希腊文明能在早期覆盖埃及文明。

“双面社会”持续了200多年

第二阶段:埃及进入“双面社会”。

经过一段时间后,两种文明的融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希腊文明开始本土化,两种文明逐渐融合,古埃及进入了“双面社会”。

比如,托勒密国王以埃及法老的形象出现,戴着红白王冠,穿着埃及服饰。虽然有一些细节模仿并不到位,例如画像中的托勒密国王骑着马,而古埃及国王是从来不骑马的,但至少说明了希腊人正努力尝试融入本土文化。

又比如,希腊人开始接受埃及的木乃伊文化。在罗马统治时期,生活在埃及的希腊人為自己定制的木乃伊肖像画上,画风还是希腊风格的。于是,埃及的习俗与古典的希腊画风奇特地融合在一起;在一块亚麻的木乃伊裹尸布上面,除了死神阿努比斯,还有一个罗马人、一个埃及人,这两个形象都是死者。同一个人以两种形象出现,这是“双面社会”的最好诠释。

到了后期,两种文明的融合更加紧密,连宗教也开始融合。例如,人们将埃及的圣牛阿皮斯和古希腊的宙斯两者融合成萨拉皮斯,名字和阿皮斯相近,形象则是宙斯的样子。

这个融合过程持续了200余年。直到托勒密王朝的最后一任女法老——克里奥佩特拉七世,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埃及艳后去世,埃及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古埃及希腊化过程才戛然而止。

就像尼罗河最终注入地中海

第三阶段:埃及文化强烈回流。

可以看到,一度灿烂辉煌的古埃及文化,在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后,经历了近三个世纪的希腊化过程,和希腊文化产生了深度的融合。这是否意味着传统埃及文化彻底消失了?答案是否定的。

古埃及文化大部分是仪式文化,不以文本为核心,但是,在希腊人的统治下,为了避免埃及文化最终失传,埃及人将自己的传统知识记录下来,也就是进行文本化。在古代,出于“被遗忘的恐惧”,很多古代文明都经历了原本口传仪式的内容形成文本,而原有的文本开始经典化或正典化的过程。

不过,在文本化的过程中,为了避免自己的

知识被希腊人学去,埃及人将知识进行加密,使其变得复杂化。我们今天认为古埃及文化非常神秘,这和其当初被人加密过有一定关系。

古埃及神秘哲学和宗教的正典化,使其隐秘的内容表达出来,并与希腊哲学汇流,作为西方思想史的游魂流传下来,也使得理解其深层内涵有了参照。即使是出于确定“自我”与“他者”的动机而开始的正典化,也成为对话的基础,甚至是进一步传播的条件。

就像尼罗河最终注入地中海,这些保存下来的埃及文化,也对地中海文明圈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響。

例如,产生于公元1世纪的基督教中就包含了很多古埃及的宗教元素;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很多人的哲学主张与古埃及传统思想有一致之处;对古埃及炼金方的研究,间接推动了现代化学的发展;今天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星座知识,其中一部分也发源于古埃及……

不管人们是出于何种目的,曲解、利用还是再消费,古埃及文明就这样被传承了下来,直到今天依然发挥着影响力。

历史是一场持续不断的对话

历史对我们的启发是持续性的。对同一段历史,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期去看,都会得到不同的启示。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一场现在与过去持续不断的对话。

在和古埃及、古希腊的这段历史对话时,我们能学到什么?我认为收获主要有三点。

首先,一个国家的主流价值观衰落时,应该从中看到希望。

希腊城邦时代被认为是希腊的黄金时代,诞生了众多的先进价值理念。到了亚历山大大帝崛起,大大小小的希腊城邦先后被其占领。表面上看,城邦衰亡了,希腊人原来的价值观失去了依附。但结果却是希腊价值观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传播和扎根,并和其他文化(如古埃及文化)发生碰撞和交融,变得更加开放和多元。

其次,面对不同的文化,要采取平等对话的态度,而不是排斥或回避。

如果自己的文化有价值,面对外来文化时就一定会发挥出影响力,即便暂时沉淀下去,也会强势回流。例如古埃及文明最终回流,对包括希腊在内的西方世界产生影响。重要的是要保持文化自信,在和其他文化对话时,主动欣赏别人的价值,也勇于展示自己的价值。

最后,放下偏见,在学习中实现“深入其中又出乎其外”,才能打造新文化。

在学习其他文化时,我们需要放下自己的偏见,换位思考,才能真正地深入其中。深入其中并不够,还需要出乎其外,与其进行持续平等的对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成打造新文化的使命。

语录

寻找下一个地球

周济林

不久前,在“造就Talk”演讲中,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院长周济林为我们讲述了人类不断寻找宜居系外行星的历程。

什么样的行星是宜居的

今年4月16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射了一颗巡天卫星,名为TESS(凌日系外行星巡天卫星),它的主要目标是寻找更多的系外行星。

为什么我们已经生活在地球这个稳定的星球上,却仍然要去找适合人类居住的行星?因为人类不可能永远生活在这个摇篮中,我们要为未来做打算。

那么,什么样的行星是宜居的?

第一,类地行星,拥有固体表面。迄今为止我们所发现的行星,归纳起来可分为两类:类木行星和类地行星。如果行星的质量大于10个地球的质量,那它就会显著地吸收气体,形成类木行星;反之,小于10个地球质量的则多半是类地行星,因为它没有机会得到更多的气体。

第二,存在液态水,且位于宜居带上。行星的宜居带必须与主星之间有一个合适的距离,而这个距离的远近取决于主星的大小。主星越小,与宜居带之间的距离就越近,辐射也就越强,人类在这样的星球上是没办法生存的。

第三,主星辐射不能太强。地球之所以适合人类生存,是因为它远离太阳,且星球内部有液态核,形成一个磁场,从而保护了我们的生命。

改造火星需一个阳光棚

相比之下,我们的邻居火星就不那么幸运了,它虽然也处于太阳的宜居带,但是目前却没有生命。

研究表明,火星以前可能是有生命的,后来由于某种原因,比如受到小行星的碰撞,把它的液态核撞没了。要知道,液核中很多是带电的离子,流动起来会产生磁场,没了它保护大气的磁场也就消失了。所以,火星现在几乎没有大气,也就不适合人类居住。

有人提出,我们不能改造火星,使得它适合人类居住;这当然可以,但所需要的成本非常大。关于改造的方法,我想可能有两种。一种是“小改造”,就是搞个阳光棚,里面种点花花草草,这样人那里至少可以生存了。另一种是“大改造”,就是搞个液态核,让它有磁场保护,这个难度就太大了。

系外行星是怎样被发现的

经过人类的不懈努力,终于在1995年发现了第一颗太阳系以外的行星。那么,如何探测系外行星呢?

一种是视向速度法。行星是很暗的,根本看不见,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去看恒星。因为行星绕着恒星转,我们观测的那个恒星,它其实有个像身份证一样的东西——光谱。利用这个原理,我们就可以反推出恒星运动是不是受到某颗行星的影响。于是,第一个太阳系外行星就这样被探测出来。

另一种是凌星法。凌星是目前被广泛应用的系外行星观测方法。它的原理很简单,当行星正好从你的视线与恒星之间经过时,你认真观察恒星,就会发现它的光度发生了变化,而且这个变化是周期性的。当然,这个变化的大小取决于行星的大小。

人类找到了多少个类地行星

TESS、James Webb、开普勒……科学界发射的望远镜中,几乎有一半都在寻找系外行星。尤其是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在它短暂的“一生”中,发现了超过3000个系外行星,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大进步。

那么,迄今为止人类找到了多少个类地行星?

大概有700到800颗。但如果我们只统计300年以内的类地行星,就只有30颗;60年以内的话,只剩下10颗。

这10颗行星大部分都来自于一个叫Trappist-1的系统,我们中国称之为葫芦娃系统。遗憾的是,它们离我们依然太远。

中国的巡天之路

前面提到了很多国外的空间项目,那么我们中国有没有自己的探测系外行星的项目呢?

我们课题组参与了南极的一个巡天项目。那里冰天雪地,气候寒冷干燥,条件非常艰苦,但这片大陆也拥有一半天文学家最喜欢的连续42天的极夜。

由于冬季气温很低,最低可达到零下83℃,人那里是没办法过冬的。所以,我们先在前一年的夏天派考察队过去,把望远镜放置并调试好后离开,让它工作一年,第二年夏天再去把数据带回来,或者通过卫星传回来。

通过这样的观测,我们在2014年发现了200余颗高置信度的系外行星候选体,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南极大区发现系外行星的科考团队。2017年,我们又又在南极发现了最大批量的系外行星。

除此之外,我们也在被称为“世界第三极”的西藏设立了天文台。位于海拔5100米的西藏阿里天文台已建成了一半,我们将在那里放置5个小型望远镜,进行系外行星的搜寻,期待能收获好的结果。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

话外音



“过去的教育限于学校之内,而现在,科技前所未有地大规模融入教育领域,打破了界限。诸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的运用开始改变教育的生态环境和方法。未来的教育应该是传统教育与科技融合的混合教育,尤其是老师的地位不能动摇。充分认识‘人工智能+教育’的育人功能,是当前教育工作者遇到的重要挑战。”

——近日,“人工智能与教育大数据峰会2019”在北京召开。90岁的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在会上这样表示。



“最近,中国一些城市陷入简单的抢人大战。我问一个问题:抢来了干吗?没有‘仗’打,就给房子,只是抢来一批房客。有‘仗’打,才能抢人,抢来人才要有用武之地。一座城市,需要全球奋斗者在这里集聚,并不断有新的奋斗者进来,城市才有长久的活力和长久的竞争力。所以,城市一定要用影响力和辐射力来统领,来吸引人。”

——在近日举行的“面向全球、面向未来:上海愿景与静安方案”跨界高端研讨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经济学家周其仁发表了上述观点。



“目前,华为面临的困难依然很大,这些困难可能会暂时影响我们的前进节奏,但不会改变前进方向。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相信在克服短期困难和挑战以后,华为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华为都将坚持开放合作,不会走向封闭和狭隘。”

——华为公司董事长梁华在2019年上半年业绩发布会上这样表示。



“我不知道马克思还让我活几天,所以我没有寒暑假,没有黄金周,必须把时间都用在孩子们身上。我希望我最后的一口气是在讲台上呼出去的,而不是在床上。我现在的口号就是那16个字:生命不息,战斗不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安徽省和县乌江镇卜陈村“留守未成年之家”,92岁的退休教师叶连平依然在暑假里免费给周边的学生补习语文和英语。他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很多人都说,中国动画电影的春天已经到了。但是我觉得,真正的春天要来到,还需要中国动画电影产出更多好作品。当大家不再提中国动画电影的崛起,中国动画电影成了大家的生活必需品,那个时候,好的电影像阳光、雨水一样,成为一种常态,国产动画电影才是真正地崛起了。”

——近日,国产动画电影《哪吒》持续火爆,累计票房超过25亿元,跻身中国电影票房总榜前10名。初次执导大银幕作品的导演杨宇(又名饺子)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表示。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

听讲座

徐光启是一位了不起的上海人

■ 李天纲

日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天纲来到闵行区“修齐讲堂”,讲述了400多年前一位“了不起的上海人”——徐光启的故事。

1562年,徐光启出生在上海老城厢,就是后来的南市区(现黄浦区)。他出生的时候,他的家族已经在上海定居了几代,所以徐光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

徐光启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的进士,也是一名天主教徒。徐光启学习西方科学,但你不能说他是崇洋媚外的人。“崇洋”有的,“媚外”却不见得。他翻译欧洲科学知识的同时,他的朋友意大利人利玛窦也请他帮忙,把《四书》翻译成拉丁文,所以,他对中国的文化是很自信的。

其实,在徐光启那个时代,西方还没有后来那么强大。欧洲学者的研究显示,一直到1800年,中国的GDP仍是世界第一。徐光启了不起,在于他在那个时候已经发现,遥远的西方有需要我们学习的地方,于是他接触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勤奋著述,被称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

徐光启是1633年去世的,但直到1641年,他才被安葬于今天徐家汇的光启公园。他是在北京任上去世的,死后被发现身边只留下一些银两,“盖棺之日,囊无余之”,一时办不起合适的葬礼。徐光启位居文渊阁大学士,可见他确是一位清官。

1641年,崇祯皇帝用御制安葬徐光启,牌坊上的对联“治历明农百世师经天纬地,出将入相一个臣臣武侯文”,概括了他一生的重要功绩。

徐光启是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400多年前,除了翻译西方著作、整理中国古代文献外,他还

身体力行,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变革。

首先,数学革命。

“几何”这个词是谁发明的?就是徐光启。中国古代的图形计算叫作勾股,并不是几何。徐光启和利玛窦合作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六卷)时,翻译Geometry(几何学)的词头“Geo”(形状),用上海方言念,“Geo”就是“几何”。《几何原本》的翻译,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原有的数学学习和研究习惯,改变了中国数学发展的方向,这是中国数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此外,徐光启还撰写了《勾股义》和《测量异同》两本书,重建了古代“汉学”的勾股、推步、测算之学。

其次,历法革命。

徐光启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主要集中于《崇祯历书》的编译。《崇祯历书》是一部比较全面的介绍欧洲天文学知识的著作,由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汤若望等人编译,共有46种,137卷。

欧洲实行24小时制,而中国古代则把一昼夜划分成12个时辰。《崇祯历书》把12个时辰再一分为二,分成24个小时辰,每个小时辰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小时”。原来中国历法体系中就以“刻”计时,一昼夜共100刻,1刻等于现在的14分24秒。《崇祯历书》直接效法欧洲,取15分钟为1刻,1小时4刻,这些都一直沿用至今。

望远镜是1608年发明的,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得知这个消息后,于次年自制了第一台天文望远镜,用于观察月球。1616年,望远镜被引入中国,而徐光启是中国最早使用望远镜观察天体的科学家。

再次,农业革命。

天启年间,徐光启遭到排挤,告假回上海闲住,开始专门致力于农业研究。他把番薯引进上海种植,在上海推广后,又发展到全国。此外,徐光启还把南方水稻引种到天津。

这场农业革命使农作物产量大增,粮食问题解决

以后,中国的人口呈爆炸式增长。明末中国人口降至四五十万,至100多年后的乾隆年间,中国人口达到了两三亿。可以说,那阳的徐光启就相当于今天的袁隆平。

由徐光启编撰的《农政全书》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汉族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和西汉氾胜之的《氾胜之书》、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元代王祯的《农书》合称“四大农书”。中国历史上的这“四大农书”,其他三本农书都是中国经验,而徐光启的农书中也有欧洲经验,比如《甘薯疏》《泰西水法》、《农政全书》是一本全球化的著作。

徐光启在1631年的《历书总目表》中,表达了自己翻译国外书籍的初衷:“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他说,翻译国外的书籍,手段是要“会通”,就是要学习外来的学问,与自己的学问融会贯通;目的则是要“超胜”,超越和争胜,即在原有的学问之上再创新学问。

所以我认为,徐光启是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上海人,他留下的遗产成为“海派文化”的重要渊源之一。中国学习西学的进程,在清朝中叶以后慢慢停滞了,大部分读书人又回到固有的旧学问中去了,而江南文化中对待科学、对待西学的包容精神却被继承了下来,比如鸦片战争以后继续翻译《几何原本》后九卷的李善兰就是上海附近的海宁人。

400多年前,徐光启把江南文化和西方文化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中西文化互相交流的传统。而这种传统,从江南文化一直延续到海派文化。19世纪以后,上海成为中国吸收外来文化的前沿,引导了清朝的现代化。上海知识分子不排斥,善于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才成就了海纳百川的海派文化。

回望历史,我们真的要感谢徐光启,正是这位了不起的上海人,带领我们走出故步自封,开阔眼界,以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